

# 评中国文坛上的“弗洛伊德热”

武 恩



精神分析学是西方心理学的一个流派,由奥地利心理学家齐格蒙德·弗洛伊德所创立。由于它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无意识、性欲、梦幻、象征等人类的精神活动,因此,其影响和意义远远超出了心理学的范围,渗透到其它许多观念领域之中,如宗教、哲学、伦理学等,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20年代传入我国后,对我国文坛也产生了震撼,产生了冲击,出现了两次“弗洛伊德热”。

第一次发端于“五四”运动前后,并持续到40年代初期。那时,西方各种哲学思潮、文学流派陆续被介绍进来,并对中国文坛产生极大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不例外。它通过各种途径,步入中国文坛,在一些译者、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中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反响、毁誉褒贬,大相径庭。有的彻底否定,认为精神分析学说“受不住逻辑的审定与理智的考查”,是“反对唯物论的布尔乔亚的反动的波澜,没落主义的波澜。”<sup>①</sup>有的则“惟笃好之”,大加褒扬,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方法是“唯物的”,“完全符合辩证法”,故把弗洛伊德捧为“精神学界的达尔文”<sup>②</sup>。特别是新感觉派的一些作家,将精神分析学说自觉地引进到小说创作之中。象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将军的头》、《石秀》,穆时英的《夜总会的五个人》,刘呐鸥的《残留》等小说,可以说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形象演示。但大多数译介者和评论家则采取了分析和批判的态度,一方面指出精神分析有“言过其实的地方”,同时又承认“其中亦包含着真理”。鲁迅先生尽管较早地接触到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且接受了其中的某些观点;但是,随着他对精神分析学说研究的加深,特别是当他完成向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之后,便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对精神分析学说唯心主义实质,特别是关于性的纯生物学观点给予了严厉的、深刻的批判。这些,都为我们今天深入了解和分析弗洛伊德的学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二次“弗洛伊德热”是最近几年来的事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随着我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术和文化交流的开展,弗洛伊德主义又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我们的思想领域和文学领域中来了。一些作家、评论家对精神分析产生浓厚兴趣,“无意识”理论、“升华”学说、“俄狄浦斯情结”等被某些作家、评论家所接受,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和文章中加以运用。有的大学将弗洛伊德理论引进课堂,开设“精神分析与文学”等选修课程。特别是1986年以来,国内连续出版了各种各样的弗洛伊德原著译本,国内外学者评介精神分析的著作,新译的、重印的、翻印的,计有百余种。仅某一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一套《精神分析译评》丛书第一批就多达十本。中国文坛上再度形成了一股“弗洛伊德热”。

我们承认,精神分析学说自创立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人们所认识,自有它合理的内核。例如无意识领域的发现,突破了传统心理学只满足

于对心理现象“表面价值”进行研究的狭小范围，建构起人的复杂心理结构的框架体系，从而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空间。再如“本我、自我、超自我”的三部人格结构，“无意识、前意识、意识”的心灵活动的三个层次以及“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概念等，虽然突出了潜意识的作用，但含有辩证因素，且目的在于“用理性来控制非理性的、无意识的欲望。”此外，它在文学领域中的应用亦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沟通了心理学与文学的联系，丰富了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段，提高了作品心理分析的深刻程度。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弗洛伊德的整个理论体系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他把人的各种本能欲望，特别是性的欲望看成是无意识的主要内容，而且把这种无意识心理在全部心理活动中的作用加以无限夸大，把它当成人类精神能量的来源和一切活动的根源。这种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势必把文学和社会割裂开来，不能正确解释各种文学现象，亦不能正确说明文学的伦理价值。这种泛性欲主义的观点也正是弗洛伊德学说的大弊所在。然而，我们的一些新潮作家和评论家们恰恰在上述观点上颠倒了是非，产生了谬误。他们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肢解了弗洛伊德完整的理论体系，剔除了精神分析学中的合理内核，而将其泛性欲主义的观点任意发挥，推向极端，从而导致了我国的性爱文学以一种病态畸变的形式膨胀发展。综观前几年描写性爱的文学作品，真正能够以一种严肃的责任感对我们民族性心理进行深入剖析和痛彻反思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而大量作品则把性意识当成了招徕读者的法宝。下面，我们拟从创作动因、文学题材、批评理论等方面，对流行于我国文坛上的泛性论观点和作品进行分析和清理。

创作动因：“性渲泄”。



所谓创作动因，就是指启发作者思考，诱发写作行为的起因。一些新潮作家和评论家认为：“两性关系永远是生命力量与人类活动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级的存在形式”<sup>③</sup>，“艺术的活动与创造，说到底，也正是一种对性的欲望的渲泄。”<sup>④</sup>这一观点并不新鲜，乃是从弗洛伊德的“利比多”学说中照搬过来的东西。弗洛伊德在《梦的解释》、《性学三论·爱情心理学》等著作中说道：人的无意识的本能欲望中，潜伏着一种名叫“利比多”(Libido)的力量，这是性欲的原始动力。“利比多”活动所遵循的是“唯乐原则”，即一味追求快感和欲望的满足。而事实上，人的欲望不可能完全满足，它要受到外界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与压抑，即受到“现实原则”的制约。艺术家们为了解除因压抑所造成的痛苦，便通过梦幻或创作活动等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文学家们之所以情思激荡，执笔为文，并不导源于客观事物对创作主体的触发，而是“性的欲望的渲泄”，是“利比多”冲动的结果。

这种创作动因说有两个致命的错误：其一，表现在怎样看待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上。我们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sup>⑤</sup>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是长期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并且在一定的创作灵感的激发下的结果，而不是性欲愿望冲动渲泄的结果。作家们通过长期的生活积累与艺术实践，头脑里储存了大量的生活印象。这些印象在一定外界条件的诱发下，便会产生创作的冲动与欲望。歌德如果没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如果没有“四面探索”的精神，他就不可能去创作《浮士德》这样大型的诗剧。列夫·托尔斯泰如果对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农民问题等漠不关心，如果没有彼留可娃案件的启示，他就不可能去创作《安娜·卡列尼娜》这部长篇小说。俄国作家契诃夫如果平时不“注意观察人，观察生活”，那么，他“脑子里的发条”就不会“忽然卡的一响”产生出一篇小说来。我国当代作家高晓声说得好：“半生生活活生生，未有动笔先有情”。由此可见，文学家们之所以产生创作冲动，首先就在于他们具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但是一些新潮作家却否认了这种观点，他们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审美的生命是“人的本质情欲”，故而把“美的

观念植根于性刺激的土壤之中”，把“利比多”当作人类精神能量的来源，让文学创作活动围绕着“性渲泄”来进行，这就从根本上把人的艺术活动与社会历史，与人的生活经历截然分割了。这种创作动因说的第二个致命的错误表现在怎样看待“无意识”与“意识”的关系上。精神分析学认为，无意识领域包括各种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而性的欲望则是无意识的主要内容。所以，主张把“性渲泄”看成是创作动因的人势必把注意力投放在无意识领域当中，而对意识在创作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则采取忽视的态度。这样，就把整个创作心理活动中的意识过程和无意识过程人为地割裂开来了。我们并不否认，无意识心理过程在文学创作中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有时使作家产生突发性的顿悟。但是，心理科学实验以及文学创作实践的大量事实证明，在人的心理过程中，无意识和意识总是在辩证统一的联系中存在着和发展着的，它们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意识与无意识构成了人的心理机制的整体。意识是人的心理高级形态，创作活动在通常场合下总是要受意识调节的。一般说来，作家在动笔创作之前，对自己的作品，就有一个总体构思；同时，在创作过程中，如果对自己创作的主题，选取的题材、塑造的人物、安排的情节等有了新的认识，那就会调整创作计划，甚至改变创作初衷。这就说明，作家、艺术家自始至终都在自觉地、主动地把握着自己的创作活动，这是“性的欲望”无论怎样“冲动”和“渲泄”，都是不能济事的。当然，为追求金钱、美女、渲泄情欲而进行创作的人，肯定是有的；然而，即使这种创作动机的产生，也主要是客观事物直接或间接作用而引发出来的；更何况，仅仅怀有这种动机而从事创作的人，从来未曾提供过真正的艺术作品。

文学题材：“性意识”。



在文学题材上，“性意识”、“性生活”曾一度成为某些新潮作家所青睐的对象。

他们大肆鼓吹“性是美的，性欲是美的”<sup>⑥</sup>，“性爱和黑幕是撩人心弦的敏感点”<sup>⑦</sup>，“两腿之间就是根”，表现它“是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号召作家们和艺术家们去描写“性开放女子”，要把笔触伸入到人的深层意识中去，把那种对于性欲“疯狂、渴求的感觉表现出来”。一位早在70年代就有了点名气的作家曾对美国一篇描写性意识和性行为的小说大加赞赏：“开始，小说描写很脏，汗水、呻吟什么的，可是渐渐地越来越感到了其中的美。……我感到那位作家真是伟大。”<sup>⑧</sup>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种着力表现性意识、追求感官刺激和生理效果的“性大潮”文学汹涌而来。我们且不说象《玫瑰梦》、《丽人春梦》、《花花世界》、《走出欲海》这些在西方世界也不入流的文化垃圾，是怎样堂而皇之地由我们国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也且不说一些街头小报和非法出版物是怎样追求内容“黄”、封面“露”、题目“刺激性大”的。单从我国“正式的”、“纯文学”的刊物和著作来看，“性意识”、“性行为”的描写亦比比皆是。情形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性欲描写。写“性欲常态”，如婚外恋、老少恋、多角恋、生死恋；写“性欲变态”，如同性恋、拜足狂、窥淫癖、阴阳裂变、两性错位、妒性心理。在这类作品中，既无社会事件的真实描写，又无政治哲理的冷静思考，一任性意识流动恣肆，借助于艺术形象，有意无意地把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学说发挥到了极致。《作家》杂志1989年6月号所载17篇同题小说《爱情故事》，可谓此类作品的集大成者。据该期责编称：这些是堂堂鲁迅文学院的“中国文化的精英们”睁着温情的眼睛，穿过墙壁和楼板寻找着有关爱情的颜色，为读者调配出来的精彩的“爱情产品”。好一个精彩的“爱情产品”！“中国文化的精英们”在这里塑造出一个胜似一个的嫖风浪荡、淫气十足的性爱狂。野合、阳痿、遗精、手淫等都在这里得到最露骨的展览；性的诱惑、性的满足在这里得到了最热情的礼赞；而20世纪的文明、道德、理性、法律、人格

却受到了最粗暴的嘲弄与践踏。其情节之荒唐、笔墨之龌龊，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另一类作品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对性意识和性行为进行描写。这类作品与前一类相比，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作者试图把性爱描写与作家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联系在一起。有的以两性关系为情节线索，揭示人物的命运，探索人生的意义；有的通过性和暴力的揭露性描写达到社会抗议和社会批判的目的。但是，无论哪种情形的性描写，一般说来，总是大胆展露有余，严肃描写不足。那些具体细致的性裸露掩盖了作者企图表达的主题，冲淡了作品的思想内容，转移了读者的视线，甚至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张贤亮同志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属于他的系列小说《唯物论者启示录》中之一部。可见，作者创作这篇小说的本意旨在表达最理性的哲学主题：探究灵与肉的冲突，深思人性的正常与反常。但是，由于作者的笔锋挺进到了人的无意识领域，完整地、细腻地描写了章永璘和黄香久之间的性爱心理历程：性饥饿——性诱惑——性冲动——性功能丧失——性功能的恢复等，并强调本能对于人格完整与精神创造力的盛衰（如写作能力）起着决定作用，因而使得主人公的身上渗透着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性意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与作者的主观愿望相悖的效果：一般读者把欣赏趣味放在“性”这个“最本能的层次”上。

那么，性爱在文学作品中，究竟能不能够描写呢？回答是肯定的。性活动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本能欲望在人的活动中也会发生作用。以人为中心对象的文学，是无法回避涉及这个领域的。但是，作家、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如果将人的这种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割裂开来，并且对人的自然属性加以片面的夸大，那么，就势必陷入唯性论的泥潭之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它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sup>⑨</sup>因此，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描写两性之爱的时候，要注意表现“灵”与“肉”的统一，要注意考虑它的社会价值与审美效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依其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⑩</sup>人的性欲本能在社会中实现时，必然涉及其它社会成员，体现某种社会关系，烙上道德、伦理、风格等社会印迹，也因此就使得性爱显示出高尚与庸俗、忠贞与虚伪、正当与淫乱的区别，其社会后果的好坏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文学著作不同于生理解剖图。以想象和虚构为主要手段的文学描写，应与严格客观的科学描述区别开来。文学中的性描写，是受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制约的。凡是创作态度严肃，品格高尚的作家，在描写性意识、性活动时，势必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以及审美理想等溶化进去，从而使性爱描写成为一种满足人们特殊精神需要的审美对象和高尚健康的、令人陶醉的爱情画面。而那些失去了理性意识和自控能力，专事色情描写，以性的诱惑来吊读者胃口的诲淫之作，则毫无审美价值可言，只能成为污染读者眼目，腐蚀人们灵魂的精神鸦片。



作品主题及批评理论：“情意结”。

“俄狄浦斯情意结”(Oedipus Complex，译“伊谛普斯情意综”)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弗洛伊德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的同名主人公杀父娶母的情节中，为乱伦欲望提取了这一术语。按照弗氏的说法，人们在婴儿期便有显著的性欲表现，如喜吮吸、摸弄、裸体、窥视等，早就对他的母亲发生特殊的柔情，视其母为自己所有物而视其父为争夺此所有物的敌人。这种柔情……我们称之为伊谛普斯情意综。而女孩子常迷恋其父而要推翻其母……父溺爱其女而母则溺爱其子。精神分析学派的苏黎世学派

大师荣格把弗洛伊德所谓女孩的这种欲望称之为“伊勒屈拉情意结”。这种“情意结”显然为社会道德、宗教、法律等所不容，故被压抑到“无意识”领域中，若需表现，就要经过“升华”的过程。文学艺术家的创作就是为使这种本能欲望得到升华而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弗洛伊德认为欧洲的三大名著《俄狄浦斯王》、《哈姆莱特》和《卡拉姆佐夫兄弟》都表现了“俄狄浦斯情意结”这样一个共同的主题。弗洛伊德的这种“情意结”理论与批评实践尽管强调了人类文明同乱伦欲望的对立和对它的压抑，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但是，这一理论的内容完全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是一种臆构的假设，显得荒谬绝伦，故为同代人和后世人所诟病。

早在“情意结”理论形成之时，就连弗洛伊德的高足门徒，如奥地利的阿德勒、瑞士的荣格等人也不敢苟同。终于同他们的老师分道扬镳。据说，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曾经这样对他说：我只是一个文学者，你可是一位科学家及发现者。但有一事，我想对你说明，这就是我从未对于我的母亲有任何的性情感。勃兰兑斯的责难无疑是对恋母情结理论的否定。

然而，我们的一些新潮作家和批评家对“情意结”理论却津津乐道，欣赏备至。他们在接受和运用这一理论时，将其泛性论的因素加以突出和凸现。有的作品用任意编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和虚假情节对这一理论进行形象的图解和演示。某刊物1989年第3期刊载的短篇小说《无忧之梦》描写了一个6岁的男孩对一个28岁的女人充满性爱意识的故事，表现了这个男孩的“恋母情结”。难怪有人称它为“一篇精神分析性的心理小说”。有的作品用一种灰暗的色调描写眼前的现实生活，这明明是作者颓丧、悲观心绪使然，可是有的评论家却把“俄狄浦斯情意结”学说当作文学批评的法宝，努力在作品中寻找一条可以窥察分析作者无意识领域的缝隙。《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1期中，《赵玫的“涩果”及其情结》一文，便把赵玫的创作说成是因为作者“生命本能痉挛般的律动”、“灵魂炼狱的煎熬”，但由于缺乏“勇气”和“东方文化的传统”的限制，所以才“通过小说释放出来”，“这一切便构成了赵玫的“情结”。这种“情意结”理论对我国批评界的影响是很深的，有的同志著文探讨我国古代诗歌名作《孔雀东南飞》里刘、焦悲剧根源时，也将“情意结”理论这种洋玩艺进口改装，进行套用。文章认为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焦氏家庭内部的婆媳关系。焦母作为中年寡母，仲卿不仅是她的儿子，也是她已故丈夫的化身。故而焦母内心深处早已埋下了性爱的种子，当儿媳进门之际，这颗种子便立刻萌发，但又被文明的羞耻所扼制，于是化为极端嫉恨的变态心理。这样就造成了刘焦之间的爱情悲剧。很明显，上述观点完全把焦母所作所为，归之于性嫉妒，就使得这部作品中揭露封建礼教罪恶，歌颂青年男女的爱情和斗争的进步思想，完全被“俄狄浦斯情意结”的“性”水浸泡得无影无踪了。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情意结”理论的主要谬误首先就在于这种理论完全从抽象的、绝对化的无意识理论出发，强调性的因素，忽略了社会历史的具体内容。我们翻开任何一部文学史，都会发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名著，都包含着不同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情意结”理论刚好在这个问题上混淆了历史的界限。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古典时期的作品，它的内容表现了古希腊人普遍关心的一个主题，那就是人与命运之间的冲突。很显然，这是当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希望征服自然而又无能为力的曲折反映。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反映了16世纪和17世纪初英国的社会现实，是那个“颠倒混乱的时代”的缩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卓夫兄弟》表现了19世纪中叶俄国从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孔雀东南飞》则详尽地写出了中国汉代一个封建家庭悲剧的全部过程。由此可见，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作品，反映的社会内容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我们用所谓永恒存在的“俄狄浦斯情意结”理论进行千篇一律的阐释和分析，那

就势必抹煞作品本身的典型社会意义和社会认识作用，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

其次，“俄狄浦斯情意结”理论在分析作家个性、人物形象特征的时候，完全从性本能的观点出发，因而否定了人的社会属性。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指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sup>⑩</sup>。哈姆莱特性格中的“忧郁”与“延宕”正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局限性。刘、焦二人的爱情悲剧，则完全是从焦母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封建礼教、家长统治以及门第观念所造成的。如果我们硬要把精神分析学当作万能的法宝，从作品中，从作家身上去寻找“俄狄浦斯情意结”，就会严重歪曲人类的心理活动和艺术的本质，败坏人们的审美情趣。



“弗洛伊德热”之所以在中国文坛再度形成，自有它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文艺创作思想刻板单一，“四人帮”褻渎人的尊严，抹煞人的价值，不准文学作品中有性爱生活的反映。改革开放的政策实行之后，人们的心灵世界空前活跃。这种社会大众心理活动的活跃与深化，势必带来作家本身心理活动的活跃与深化。所以，当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及西方弗洛伊德式的文学作品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一些作家、批评家终于冲破性爱这个禁区，对性文化进行认真的思考，性爱文学亦应运而生。应该说，这是一个觉醒，一种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前几年，由于教育失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一手硬、一手软”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曾几何时，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在文坛上轮番兴起，而马列主义理论反倒冷落一边。在这种“小气候”下，一些“自由化”思想严重的新潮人物放弃社会责任感，在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中，对精神分析学中的泛性主义观点进行盲目的推崇与宣扬，热衷于原始本能的挖掘和主观内心的体验。结果，性爱文学在中国当代的文苑中结出了一些畸形变态的“涩果”，得不到广大群众的审美认同。目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使中国的文坛得到了整顿和治理。时代的要求，将决定着作家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那种思想健康、含蓄蕴藉、文雅优美的性爱文学能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艺术上的享受。我们殷切地盼望着这样的力作。

注释：

- ① 史托里雅诺夫：《机械论批判》，任白戈译，上海辛垦书店1936年版，第366～367页。
- ② 黄嘉音：《精神界的拓荒者》，《西风》第40期。
- ③ 张贤亮：《清买〈张贤亮选集〉》。
- ④ 徐德仁：《超级名画的背后——凡高与弗洛伊德美学》，《艺术家》1989年第7期。
- ⑤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
- ⑥⑧ 宗福先：《性是美的》，上影画报，1989年第5期。
- ⑦ 汪天云：《注目主调：红与黑》，《上影画报》，1989年第5期。
-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页。
- ⑩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 ⑪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文学艺术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415页。

（本文责任编辑 张炳焯）